

# 论汉画像石的灵魂信仰和象征艺术

□ 王亚军

## 一、画像石

“作为重要的文化遗产,遗留至今的各类汉代画像不仅具有重要的艺术研究价值、更为直观的文献价值,而且具有极高的民俗文化研究价值。”<sup>[1]</sup> 汉代后期时期的墓室图像是在继承汉初墓葬文化基础上,对当时俗民盛行的思想和信仰进行整理和综合,而创造出的蕴涵深刻而丰富的灵魂世界的象征艺术。笔者拟从出土的汉代墓葬画像石和墓室相关的壁画等来探讨当时俗民对死后灵魂世界和神仙世界的构想,来对汉代时期民间信仰的情况补充做有益的尝试。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发现的汉画像石总数在一万块左右,分布在东至海滨,西到甘肃、四川,北达榆林、北京,南抵浙江、云南这一广阔地域内。其中除个别为摩崖造像和神庙石阙上的画像外,其余全部属于墓葬及其附属的地面建筑(祠堂和阙、碑)上的画像。”<sup>[2]</sup> 而汉代时期的画像石在江苏、四川、山东等地均有发现,“三国东吴时期的墓葬沿用汉制,墓砖纹饰亦沿袭汉式,只是规模有所缩小,随葬品数量也略有减少。此期画像砖墓共10座。”<sup>[3]</sup> 学者已经通过考古材料对汉画像石的墓主的身份研究认为“汉代王侯贵族一类的上层统治阶级在墓制中不存在使用石刻画像的现象。”<sup>[4]</sup> “汉画像是汉代中下层人群的遗存,它反映的是民间、民俗的东西。”<sup>[5]</sup> 尽管相对前代的画像石汉代时期的规模和数量都相对减少,但在墓葬中用于陪葬的画像石的习俗仍然有生命力,仍不影响窥见当时俗民的死后灵魂信仰的一般规律。

## 二、灵魂信仰的延续

### ——对前代画像石的改造和加工

“一旦一种风格、一门艺术或一种信念开始

正当地流行于世,就会长久地受到干扰和影响,但是这种影响极其细微,所以得以保存,代代相传。”<sup>[6]</sup> 画像石作为一项民间工艺,在历史的过程中不断传承和发展,但是由于当时社会的战乱,尤其是做画像石的创作主体的工匠减少和逃亡,导致此时的画像石艺术形式发生变化,需要指出的是汉代后期汉画像石出现新的情况,就是通过前代的画像石的改造和加工直接成为新墓主的画像石。“在第一和第二分布区,都发现一些魏晋时期的墓葬是利用拆毁的汉代墓室和祠堂画像石建造的,以至墓中画像石的位置错乱颠倒,完全看不出任何配置规律。”<sup>[7]</sup> 不可否认当时有部分画像石是建立在拆墓和盗墓的基础上的。当时社会秩序混乱,盗墓现象变得日益普遍化和公开化。《三国志·卷四八·吴书三·三嗣主传》引葛洪《抱朴子》曰:“吴景帝时,戍将于广陵掘诸冢,取版以治城,所坏甚多。复发一大冢,内有重阁,户扇皆枢转可开闭,四周为微道通车,其高可以乘马。又铸铜为人数十枚,长五尺,皆大冠朱衣,执剑列侍灵座,皆刻铜人背后石壁,言殿中将军,或言侍郎、常侍。”<sup>[8]</sup> 《后汉书·赵孝传》云:“时汝南有王琳巨尉者,年十余岁丧父母。因遭大乱,百姓奔逃,唯琳兄弟独守冢庐,号泣不绝。”<sup>[9]</sup> 可见当时有人能继续守墓冢已经非常少见,“惟琳兄弟独守”。又见《后汉书·谢夷吾传》,“左转下邳令,豫剋死日,如期果卒。勒其子曰:‘汉末当乱,必有发掘露骸之祸。’使悬棺下葬,墓不起坟。”<sup>[10]</sup> 正是有上述盗墓行为的存在导致了有“汉末尝乱,有发掘露骸之祸”的预言。从侧面反映出战乱对守丧习俗的影响,当然可以印证当时拆毁和改造前代画像石的事实。当时较为安定的地区自然有部分遗存。“四川画像砖均系东汉桓、灵以至蜀汉时期制作的。”<sup>[11]</sup> 实际上随着考古材料的新发现,



图一 浙江海宁画像石拓本

“时代可以延续到魏晋时期。”<sup>[12]</sup>可见当时的俗民也想要在地下灵魂世界有更好的生活,也要享受神仙一般的死后世界,画像石的图案和内容是相对稳定的,显示出民俗的传承性在发挥着重要作用。

### 三、独特的丧葬艺术和神灵世界的建构

画像石是墓葬中特殊形式随葬品,其图案具有特殊的民俗文化内涵,是俗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死后世界描绘的艺术形式,是对当时社会现实和心理期望的真实写照。画像石图像的具体化和生活化,是当时俗民灵魂信仰发展的必然结果。这种信仰又反过来影响丧葬习俗。学者蒋英炬、吴文祺认为“画像石是我国古代为丧葬礼俗服务的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具有浓郁的民族色彩和时代特征。”<sup>[13]</sup>信立祥先生也认为“在本质意义上汉画像石是一种祭祀性的丧葬艺术。”<sup>[14]</sup>也有学者认为“正因为包括画像石在内的祠堂和墓室建筑装饰有为死者营造一个理想化的死后世界的功能,它的装饰内容就有明显的倾向性。”<sup>[15]</sup>下面我们选取汉代时期的画像石做个案研究,结合相关的历史文献,分析这一民俗文物的功能和民俗文化内涵。

山东地区墓葬出土的汉画像石“甘珍滋味兼设,随时进纳,省定若生时。”<sup>[16]</sup>还有“阳遂富贵,此中人马皆食太仓,饮其江海。”画像石透露出人间享受的一切,灵魂世界也必须拥有。山东嘉祥的三国或两晋画像石,“中间端坐西王母,左右各跪一人手持珠树。其后,左方有一持板的鸛道怪物。右方有二人手持仙草(或嘉禾)跪向西王母。”<sup>[17]</sup>则是把西王母的神话作为画像石的主题,体现了当时民间的神仙信仰。

浙江海宁<sup>[18]</sup>墓葬出土的东汉晚期至三国的画像石(图一),内容则更为丰富。全图自北向南刻有比肩兽、奔马、兔、玄武、飞燕、玄女、奔鹿、朱雀、平露、山产玉璧、石函、比目鱼、双瓶、蚌生明珠、灵芝草等等。

四川地区典型的的就是大邑县董场乡三国画像砖墓(见图二、图三)。内容如下:“砖的正中上方刻一人首鸟身的羽人,腹部有一圆轮,双翅展开,双羽之上各有一颗星,其下有一双手托头,其头上长一对长耳,著交领衫,下肢作弓箭步,两侧各有一颗星,右方的星有羽。在羽人的两侧有一对双重檐的阙,双阙之后还有一对单檐子阙。大阙前各有一人持戟相躬身站立,阙檐两旁各有一蛇身人面像,为伏羲、女娲,其下各有一颗星。”<sup>[19]</sup>



图二 四川大邑县董场乡三国伏羲女娲画像石拓本



图三 四川大邑县董场乡三国西王母主题画像石拓本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栩栩如生的画面呢?从考古学者那里我们找到答案:这样的排列,内容似乎显得庞杂混乱。但仔细研究起来,这些画像砖是有它的内在联系的,它的中心思想还是明确的。那就是,墓主人想像自己死后,灵魂是要升天的。神鬼世界和现实世界一样,也存在着大欺小、强凌弱,以及疫病猖獗等问题。因此就得借重神荼郁垒,把通往九天道上的恶鬼捉尽;借重方相氏,把疫病之鬼击毙或驱逐。然后乘着辒辌车,在驹吏和戟吏的前导下,体体面面地往九天进发。进九入天,首先要通过天阙,那里有帝閤躬迎,有伏羲、女娲等候。然后再从建木登上天庭。到达天庭的第一件事,就是向西王母乞讨仙药,以便位列仙班或者还魂阳间。天庭也像人间一样,熙熙攘攘,神鬼们无不纵情六博舞乐。肚子饿了,天仓里储存有无计其数的粮食,可以任意向仓长或仓令领取,这就是墓主想象中的无忧之国天堂。”

画像石是当时民众创造的独特的丧葬艺术,每一幅图像并不是单纯的画像,画像石的每一个细节都渗透着俗民的情感和信仰,蕴含着丰富的民俗文化信息。无论是伏羲、女娲、西王母等神话人物,还是对死后灵魂世界的描绘,一方面是为了通过这些图像艺术传达着俗民的死后鬼神世界的愿望和要求,另一方面也在无形中构建当时俗民死后神灵体系。当然画像石的内容丰富,每一块所表达的信息会有所差别,因为俗民需求的多样性,造成画像石民俗文化内涵的多样性。不管画像石的内涵多么复杂和深奥,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汉代画像石是俗民对死后灵魂世界的艺术加工和再构造,是当时俗民生产和生活以及民俗的图像艺术表达。画像石中各种形式表现的演出场面,一方面表示了生者对于死者的永久性祭奠,一方面也体现了当时俗民希望在灵魂世界仍能永享人间之乐的愿望。可见,汉代时期民众通过画像石把抽象的灵魂信仰形象化和艺术化,向我们展现了民众死后灵魂世界复杂而又多彩的生活。文物既是传承原始思维的重要载体,又是民众精神世界和丧葬习俗的物化表现。作为重要的遗产,墓葬中还存在着大量民俗文物仍值得我们去梳理和研究,为挖掘文物中的神秘文化和信仰研究提供宝贵的文献资料。

[1] 陈江风《汉画的民俗文化价值与观念基础》,《民间文化论坛》2004年第3期。

[2] 信立祥《汉画像石的分区与分期研究》,俞伟超《考古类型学的理论与实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237页。

[3] 武翔《江苏六朝画像砖研究》,《东南文化》1991年第1期。

[4] 罗伟先《汉墓石刻画像与墓主身份等级研究》,《四川文物》1992年第2期。

[5] 周保平、徐玲《从汉画像石看汉代的民间信仰习俗》,朱青生《中国汉画学会第九届年会论文集(下)》,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4年版。

[6] [英]泰勒(蔡江浓译)《原始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6页。

[7] 具体可参见信立祥《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文物出版社2000年版,第20-21页;此外,周保平《再用汉画像石墓研究》,《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第108~111页。

[8] (晋)陈寿撰《三国志·卷四八·吴书》,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162页。

[9] (宋)范晔撰《后汉书·卷三十九·赵孝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300页。

[10] (宋)范晔撰《后汉书卷八十二·谢夷吾》,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715页。

[11] 冯汉骥《四川的画像砖墓及画像砖》,《文物》1961年第11期。

[12] 袁曙光《略论四川新发现的六朝画像砖》,《四川文物》1989年第3期。

[13] 蒋英炬、吴文祺《汉代画像石与画像砖》,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

[14] 信立祥《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文物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

[15] 杨爱国《汉代墓室建筑装饰与随葬品的关系》,《四川文物》2001年第4期。

[16] 济宁地区文物组、嘉祥县文管会《山东嘉祥宋山1980年出土汉画像石》,《文物》1982年第5期。

[17] 朱锡禄、嘉祥县文管所《嘉祥老洼发现一批汉画像石》,《文物》1982年第5期。

[18] 嘉兴地区文管会、海宁县博物馆《浙江海宁东汉画像石墓发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5期。

[19] 《中国画像砖全集》编委会编《四川汉画像砖》,成都:四川美术出版社,2005年版,第28页。

(作者工作单位:云南红河学院人文学院)